

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孔繁岭

内容提要 七七事变后,主要激于爱国义愤,欧美留学生的近半,关内留学生的几乎全部,毅然回国,投入抗战洪流之中,在教育、科技、文化等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有 2500 名左右滞留海外。战时,鉴于外汇的紧缺和战后的需要,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经历了前严后松的变化,约有 1500 名学子被派赴海外,主要前往美英。与此同时,沦陷区各伪政权积极推行留日奴化教育,连同台湾,约有 1.8 万人前往敌国。整个抗战时期,这两万余名在海外的学子,情况各异,总体上说较为艰难。然而多能刻苦攻读,故成绩斐然,对抗战的胜利和世界科技的进步、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 抗战时期 留学 政策 概况 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留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至今仍是研究中的薄弱部分。本人谨就所见资料,对其情况作以略述,以抛砖引玉,推动对其研究的进展。不当之处,敬请明者不吝赐教。

一 战发后的回国潮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归国。留日学生首当其冲,他们身处敌邦,悲愤返归。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近 4000 人踏上返途;到 10 月下旬,6000 余人几乎全部回国。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也纷纷回返共赴国难。抗战前夕,中国在欧美各国的留学生共约 4000 人,到 1938 年 5 月,回归者几乎占了总人数的

一半。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归国效力的留学生总数约 8000 余人。

抗战初期回国潮的形成,固然有留日学生不堪迫害,欧美留学生经济来源中断,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回国等原因,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共赴国难的使命感,无疑起了决定作用。他们在归国宣言中说:“我们回国并不是贪生怕死,想息影家园,我们回国完全是为了祖国。”有些不顾即将到手的学位,毅然返归,他们大声疾呼:“宁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有些放弃如旅天堂的优厚条件,回到战乱的中国进行艰苦创业,他们说:“为了祖国母亲的强大和安全,我们甘愿做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有用的傻子。”

后来有中国现代“文化昆仑”之誉的钱钟书,当时正和妻子杨绛在巴黎过着法国情调舒适安逸的留学生活,但内心却不平静。他于 1935 年夏婚后不久,和妻子一块到英国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深造,两年后又一起转到法国巴黎高年级班进修。本想攻读学位,已着手写博士论文。但是,身处异国他乡,这里的山水景色近于江南,常常触起他的乡愁。他在巴黎有一首《哀望》诗曰:“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齷恨,无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亡国之民命如蝼蚁,爱国志士身为国殇,他只恨自己不能杀敌效国,空有一腔报国之情亡国之恨。眷恋家国的思归之情,使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再也无法在法国继续读书,遂于 1938 年和夫人、幼女回国。^①

中国水利水电专家张光斗院士,1934 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他回忆:七七事变后,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五六人,“经常聚

①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44—946 页。

会,阅读报纸上的抗战消息,爱国情绪高涨。大家都想回国参加抗战工作。我爱国心切,决定弃学回国,威斯脱茄特教授和萨凡奇博士都劝留,最后同意我回国,并说哈佛大学的门永远是对我开的,随时欢迎我返校学习,奖学金保留。我与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回国。”^①

中国岩石矿床学家王恒升院士,1937年获瑞士苏黎世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七七事变后决定尽快回国。他也回忆道:“当我向教授提出时,尼格里教授说:‘王先生,你的博士论文很有创建性,你留在这里工作,一定大有前途。再者你是受过高等教育颇有才智的地质科学青年,如果在战争中牺牲了,岂不可惜?’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能眼看着祖国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现在祖国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国抗击侵略者。’我的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教授,他说‘王先生,中国抗战一定能够胜利,因为中国有你这样的好儿女。’”^②

留学生回国后便积极地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之中。留日学生最先回到上海,顾不上与家人团聚,就投入了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担负起宣传、募捐、和慰劳前线杀敌将士的任务,学习戏剧电影的留日女子颜一烟任理事。她随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出发,9月转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任秘书,写剧本并演出。归国留日学子还创办刊物,发表论文,举办各种讲演、讲座。因其久居日本,熟悉敌情,日文也较好,故能分析日本侵华的原因、战略和策略,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备、民情等,在抗日宣传方面一展所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32页。

②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506页。

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乔冠华,当年回国后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满怀寻求救国之道的豪情,前往日本公费留学。因进行反日活动,1935年被日本警察押送回上海。随即同季羨林同去德国留学。卢沟桥事变爆发,留学生纷纷回国,他也呆不住了,提前写了篇关于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交给了德国老师,也顾不得是否通过,便与几个同学一道去巴黎,同中国留法学生会取得联系,于1938年2月3日乘“霞飞”号邮船回到香港。回国后,他在《时事晚报》的任务是写国际时评,每天一篇,有一篇曾被毛泽东大加赏识。那是苏联和芬兰战争爆发后,他写的《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了有人利用苏芬战争来推波助澜,发动一场反苏战争的国际大阴谋。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一口气读完此文,手中的烟早已熄灭而没有察觉。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好文章!好文章!”“此文可顶战场上两个师!”正是这篇文章让毛泽东第一次了解了乔冠华。^①

除文科之外,军、工、理、医等专业的留学生在抗战时期尤为各方面所急需,回国后他们在科研设备和原材料奇缺的情况下,仍作出突出的成绩。现代著名光学家龚祖同,1934年公费留德,攻读博士学位。在论文即将完成尚待答辩时,抗战爆发。他顾不上答辩,舍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匆忙赶回祖国。回国后,他创办起中国第一个光学工厂,为制造前线急需的光学仪器而努力攻关。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38年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经大批生产后用于前线。

有的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培训前线急需的军事技术人员。中国当代电讯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蔡金涛,1933年考取清华赴美留学,1935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底回到国内。他回

^①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2—1043页。

忆说：当时“国难当头，一切为了打击敌人。在桂林四川会馆地质所李四光所长主持下，我和内迁的物理所成员举办了二期报话人员培训班，为前方输送了 200 多名报话人员分配到广西的抗日前线。”^①

有的回归后努力创建水电事业，为兵工厂的用电作出了贡献。中国水利水电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光斗，1937 年底到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工作。先设计狮子滩水电站，因工程太大，政府无力修建，转向小水电站，设计了桃花溪和下清渊碛两水电站，装机 4000 余千瓦。1939 年又任 渡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主任，负责修建仙女碛和鲸鱼口两水电站，装机 2000 余千瓦。^②这些电站虽然规模很小，但都是我国自己修建的第一批水电站，全部供给兵工厂用电，对坚持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急需钢铁，有的留学生回国后在这方面贡献出聪明和才智，冶金学家靳树梁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于 1938 年 2 月提前回国，第一个任务是参加拆迁汉阳钢铁厂等至四川大渡口重建的工作。苦干了三个月，终于在日军逼近时，完成了预定的拆迁 100 吨高炉和两座 300 吨平炉的任务。后鉴于修建大型高炉需时长和本地矿层贫薄，提出了修建 20 吨高炉的方案，由他负责完成。他还为永荣铁厂和云南钢铁厂分别设计了 5 吨和 50 吨高炉。终于争得了时间，较快地为抗战提供了生铁。1940 年资源委员会为补充大渡口钢铁厂生铁的不足，接办了威远钢铁厂并调靳树梁为厂长。当时厂内异常荒凉，建厂 11 年耗资 10 万银元，未能出铁。他到任后进行了艰苦地复厂建厂工作。同时针对小型高炉普遍存在的焦耗高、产量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试验，设计出了“小型炼

①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 942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 832 页。

铁炉标准炉喉”。此成果曾获国民政府经济部 305 号五年专用证书及教育部学术审计委员会奖金 1000 元。他还从多方面进行研究,改进进风嘴倾角;防止炉缸冷凝;增加炉底防潮设置,以及被人们称为“靳氏”的简易烧结法等,均在实际生产中收到一定效果。威远铁厂生产逐年上升,1942 年产铁 18.44 吨,1943 年为 1704.23 吨,1944 年虽因水灾停炉大修两个月,但各类生铁总产量仍上升到 2430.87 吨,为抗战出铁奉献了力量。^①

也有的留学生投身于农村,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水利专家和海岸工程专家严恺院士回忆道:“我在完成了在荷兰的学业后,急欲回国参加抗战工作”,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抗战的后方昆明,并响应当局的号召:‘前方抗战,后方生产’,投身云南省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云南省,查勘和策划了工程项目。”^② 云南省弥勒县的竹圆坝引水灌溉工程是他从事的第一项灌溉工程建设。

回国后留学生进入教育界的为数最多,它充实了抗战时期的师资队伍。抗战爆发后,平沪等地各大专院校纷纷迁至西南大后方,许多年事已高、拖家带口的大学教授未能随去,而大批归国留学生进入高校,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甚至有所扩大,使战时的高等教育反而比战前有了一定的发展。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女教育家陈久敬,抗战前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本计划攻读博士学位,但日军侵华消息不断传来,使她日夜不能安心,并激起对日军的仇恨,渴望归国,为祖国出一把力,尽炎黄子孙之责。1938 年夏,便乘船经香港绕道回到抗战首都四川重庆,受

①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 936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 780 页。

成都光华大学之聘,教授三班大学生英语,培训专业人才。^①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力学家徐芝纶,193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有两位教授劝读博士学位,并保证领取最高奖学金或者研究助教,但他都婉言谢绝,而回国后到浙江大学任教。他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浙江大学只讲了一个半月的课,以后迁到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每到一处就在庙宇里或在地主的祠堂里上课,或者临时搭一些草棚子上课。同学们买不到教科书,学校也无法印出讲义,教学内容全靠教师在黑板上写。晚上没有电灯,只好在菜油灯下备课。更苦的是常要躲空袭,有时一天两次,上午躲了,下午又要躲,甚至不得不在防空洞里备课。当时我年轻力壮,有些课程没有人教,我就顶上去。在浙大的六年期间,我教过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结构设计、桥梁设计、土壤力学、基础工程、水力学、水力发电工程、水工结构、坝工设计等十多门课程。”^②

抗战时期的归国留学生,除大部分前往大后方外,也有不少人转赴延安。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学院,刚从德国回来的有机化工博士陈康白担任了副院长,后任院长。陈1932年留德,1937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亲自主讲有机化学等课程。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是解放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在该院领导中,留学归国者还有教育处长屈伯川(留德博士)、总务处长杨作材(留日学生)等。去延安的回国留学生中,文化人更多。如现代作家和诗人柯仲平、田间、高长虹、雷加、臧文远,著名版画家刘岷,女剧作家颜一烟,经济学家丁日初等。

① 陈久敬:《为民族昌盛而留学》,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②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897页。

抗战爆发后,有些正在海外访问的专家学者也匆忙回国。如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严济慈,卢沟桥事变时,正在巴黎访问,不久动身而归。在昆明北郊黑龙潭龙泉观的古庙里,进行了艰苦的科学研究。鉴于战时前方部队和后方医疗器械的缺乏和需要,决定从事水晶振荡器、测距镜、显微镜等的研制。从光学计算、镜片磨制,到装配和检验,无不亲自动手。4年内先后制成1000多具无线电收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水晶震动器,300多套步兵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以及500架1500倍显微镜,同时训练了青年徒工10余人。鉴于他对抗战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被授予胜利勋章。^①

一些曾受国民党当局迫害通缉而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陶行知、王礼锡等,也陆续重返祖国,投身抗日。流亡知识分子虽不能归属于正式留学生之列,但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及其归国情形,与留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似之处。郭沫若1937年回国,次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在1941—1943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6部历史剧。向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的反抗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主线;反对侵略、反对卖国、反对暴政,主张爱国爱民、团结御敌是其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来的共同主题。剧中一幕幕的悲剧唤起人们对现实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如《屈原》,1942年夏在重庆公演,人们挥泪争相观看,“雷电颂”广泛流传。演出的效果,达到了作者要“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②的目的。

①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61页。

② 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人民日报》1952年5月28日。

二 留学政策的变化

抗战初期和后期,中国的留学政策有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变宽松为严紧,严格限制出国留学;第二次是突破限制,较大幅度增加出国留学派遣数量,并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级技术专精人才和业务管理人才上。

(一) 初期的限制政策

抗战爆发以前,南京政府教育部有关公费、自费留学的政策、法规较为松缓,管而不严。有人说过:“国外留学生,在欧美各国,罔不加以严密之限制,我国过去(指抗战前)对于出国留学之举,向采取放任主义”。^①如1933年教育部公布的经过修正的《国外留学规程》第二章第五条关于公费留学规定:“各省市考送派赴国外研究专门学术者,应注重理、农、工、医等专科。研究科目之种类,公费名额、留学国别、年限及经费状况等,经由各省市依其地方情况之需要及所研究科目之性质,于每届招生前详为规定,呈部核准施行。”^②

教育部把公费生派遣的相当大一部分权力,交由各省市掌管,而没有在全国实行对留学的“统制”或限制。对自费留学,更近于放任自流,只要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具备证件,呈请教育部审查核准,发给留学证书,即可出国留学。

自全面抗战爆发之日始,有限的财力都用于抗战,经费严重紧缺,外汇尤其匮乏,国家实已无法承担大批留学人员的巨大费用。因此之故,不得不对留学教育加以限制。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第十三条规定:“改

① 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编译馆出版,第1991页。

② 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编译馆出版,第2082页。

订留学制度,务使今后留学之派遣,成为整个教育计划部分,而于私费留学亦加以相当统制,革除过去分歧放任积弊。”^①故战时初起,中国曾一度限制留学生之出国。唯获特准得有外汇奖学金或补助费者,仍得出国,但以改习军、工、理、医等科目为限,所以一面节约外汇,一面提高留学生素质,俾学有所长,且配合国防需要。

1938年6月公布由教育部与财政部会商拟订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共有以下四条:

1. 凡选派公费留学生及志愿自费留学生,研究科目一律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迫切需要者为限。

2. 凡公费或私费留学生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1) 公私立大学毕业后,曾继续研究或服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2) 公私立专科学校毕业后,曾继续研究服务四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3. 现在国外留学生领有留学证书,其有特殊成绩,确须继续在国外研究,或其所习科为军、工、理各科有关军事国防者,经肄业学校及驻外各大公使馆证明后,得以通融延长。

4. 现在国外留学生,未领留学证书者,请求外汇时,教育部一律不予证书,其愿即行回国经驻外大公使馆证明属实者,得呈请教育部发给回国旅费外汇证明书。^②

以上“暂行办法”从学习科目、服务年限、工作和研究实绩等方面对公费、私费出国留学作了限制。

①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王春南:《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939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了《修正限制留学暂行办法》,教育部于该年8月1号公布。《办法》对出国留学的限制较前更严。它共有9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在抗战期内,公费留学生,非经特准派遣者,一律暂缓派遣;自费留学生,除得有国外奖学金,或其他外汇补助费,足供留学期间全部费用,无须请购外汇者,一律暂缓出国。”第六条规定:“已在海外之公费生,所习科目非军、工、理、医有关军事国防之科学,而出国已满三年者,应令即行回国,但出国未满三年,而成绩不佳者,得令提前回国”。第七条规定:“已在海外之自费生,如成绩不佳,应令提前回国”。^①

根据以上修正了的“暂行办法”,非经“特准”,不得公费出国留学;而自费留学,必须获得有足够的国外奖学金或外汇补助费,无须请购外汇,这样,无论公费出国留学还是自费出国留学,都极不易。不仅国内的极少能出去,已在海外学习的,也不得不大批回国。

《限制留学暂行办法》及《修正限制留学暂行办法》是根据战时形势和抗战需要制定的,是一种不得已的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既有利也免不了有弊,且越往后,弊端越是明显。实施的结果,使大批有为青年学生失去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同时造成了留学教育在科目上的“跛足”,除跟国防有直接关系的军、工、理、医等之外,其他科目的学生,数年间几乎不再有出国留学的可能。由此带来的是人才在专业结构上的某种失调,及行政部门、研究机关、各级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文、哲科人才的严重缺乏。因此,留学政策的调整势在必然。

(二) 突破限制大量派遣

1943年,国民政府鉴于国际形势好转,抗战胜利在望,战后建

^① 《教育部公布修正限制留学暂行办法》,《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5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5—866页。

设亟需人才;又鉴于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定,国际环境向中国的留学教育提供了较前有利的条件,乃决定突破以往的限制政策,大量派遣留学生。蒋介石 1943 年 4 月 28 日机密(甲)第 7628 号手令提出:“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呈报为要。”^① 据此教育部拟订了中程五年留学教育计划《留学教育方案》和短期计划《三十二年度教育部遣派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南京政府中央设计局也会商教育部、经济部、交通部拟制派遣国外学习人员计划。其中教育部《留学教育方案》规定:“修订限制留学办法为战时留学办法”,“留学生之派遣,以适应实业计划实施之需要,培植高级技术专精人才及业务管理人才为主要方针,同时顾及国家各项建设之需要,并造就高等教育师资。”计划从 1943 年至 1947 年,由教育部每年选派公费留学生 1000 名,自费留学生每年亦 1000 名,在 5 年之内,公费自费留学共 1 万名。^②

1943 年 10 月,《教育部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出台。《办法》规定,“自费留学生每年派遣人数”“暂以六百名为最高额”,学科暂定习实科(包括理工医农等科)占十分之六,文科(包括文法商教育等科)占十分之四”;资格为“曾在国内公立或已立案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须经过本部考试,考试及格后,由部发给留学证书”;报名应试时除提供必要证件外,还要有“留学费用证明书(是项证明书须由银行商号或担保该生费用之机关或公私法人出具正式证件,无论国币或现存外汇须详细注明数字,并应估计留学期间

① 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编译馆出版,第 2082 页。

② 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编译馆出版,第 2084—2087 页。

应需各项费用及往返旅费,填明确实数字,以凭审核)”。^① 以上规定,除须考试一项外,较之过去皆有所放宽。次年4月,教育部又颁发《大学教授、副教授自费出国进修办法》4条,规定在抗战期内,除研究社会学科者外,“现任各大学教授、副教授,其资格曾经本部审查认可,并任职满5年以上,所教授或研究之学科确有出国进修之必要,而自行筹足经费者,准予出国进修”。并须呈缴国内外大学毕业证书、出国进修费用证明、出国进修计划等;进修时间“以两年为限,并应如期返国服务”。^②

(三) 其他政策

1. 回国留学生登记办法

为统筹抗战期间留学生服务及继续学业起见,1939年1月31日,教育部公布《抗战期间回国留学生登记办法》。规定:申请登记之留学生,以领有教育部发给之留学证书者为限;登记地点在重庆本部,但在外埠者得用通信登记;申请登记时,须填具登记表,并呈缴国内学校毕业证件及国外学历证明文件。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按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之:(1)国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大学毕业后在国外研究院研究一年以上者,由教育部就可能范围内,按照本人专门研究,分别介绍服务,并得由教育部指定相当工作,酌给生活费。(2)出国前在国内专科以上学校尚未毕业,出国后在国外专科以上学校亦未毕业者,由教育部按照其所习学科,分发于国内同等学校试读,俟学期试验及格后,编为正式生。^③

① 《教育部国外自费生派遣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72—873页。

② 《教育部颁发大学教授、副教授自费出国进修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75页。

③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1—862页。

1940年4月,教育部长陈立夫在致行政院《请转给各部会录用回国留学生服务呈》中指出,前曾订定,《抗战期间回国留学生登记办法》,以谋解决,“即凡在国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者,由本部在可能范围内,按其专长,分别介绍服务,并由本部指定相当工作,酌给生活费。办理以来,收效尚宏,唯查回国之留学生自谋工作者固多,其未有工作机会而来部登记,由部发给生活费者,亦复不少(截至最近为止共计一百一十九名),其由部介绍工作之机关,大抵限于教育有关方面,如派往国立编译馆服务,及介绍至各大学担任教职或研究工作”。他认为:“抗战期间,百端待举,各方需材孔殷,回国之留学生既各学有专长,自应代谋适当之位置,俾就其所学,作特殊之贡献,报效党国,以符总理‘人尽其才’之至意。如仅限于教育方面工作之介绍,殊不足以宏图国家培养人才之本旨。查国内农工采矿及其他交通运输、建设等技术机关,值此抗战建国兼程迈进之际,此项专才,需用孔亟。拟请院通令各部会转给所属机关,以后需用是项技术人材,及举办各项建设事业,希能尽量聘用回国留学生担任工作,并经由各部会咨请本部介绍,庶留学生回国免生抱才向隅之憾,而亦所承弘国家百年树人之大议。”^①

2. 留学生分发服务简则

1939年7月28日,教育部颁发《抗战期间回国留学生分发服务简则》17条,规定留学生分发工作为编译、研究、教学、技术及其他工作,由教育部审查时依其专长及志愿,酌量分派给生活费;留学生分派在学校或机关任研究工作者,应自行撰写研究详细计划,商得主管人员同意呈部核定后开始工作;留学生分派在各校研究或服务者,各校如有需要得指定其担任教学或其他工作,惟教学时

^① 行政院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间以六小时为度;分配担任编译工作之留学生,应自行拟定编译计划,呈部核定,每月所编文稿,至少须满一万五千字以上,如系译稿,每月至少须满二万字以上;应于每月底呈缴工作成绩,以凭核发生活费;留学生分发服务后,立即呈缴不兼职证明书,证明人须具下列资格之一:(甲)现任荐任以上公务员;(乙)现任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如查明担任其他有给职务者,追还已领生活费,取销登记资格。^①

3. 奖助金设置办法

为奖励国外留学成绩优良而家境清寒者,1942年7月,教育部颁布《国外留学生奖助金设置办法》。奖助金分在欧美各国设置,其科目以各国擅长学科为主,名额为40名,具体为:英国8名,其中文艺学科、社会学科、理科、工科各2名。美国12名,其中文艺学科、农矿科各2名,社会学科4名,工科5名。德国10名,其中文艺学科、医科、理科各2名,工科4名。法国10名(比、瑞附),其中文艺学科、工科各3名,社会学科4名。

奖助金每名年给美金一千元,经部核定后由各驻外大使馆转发。

奖助金每年评定一次,申请之学生,须将学业成绩单、研究报告及著作等件(均须由原任教授签字,经使馆盖章验证),并填具申请书两份,呈由各驻外使馆转部办理。教育部组织审查委员会,分别审核,决定录取名额。^②

4. 加强统一领导

① 行政院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4—865页。

② 《教育部国外留学奖助金设置办法》,《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6—868页。其中美国共12名,而各科总数为13名,有误。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在施行党化教育,加紧对教育界实行控制的同时,强调应加强当局对留学教育的统一领导。1943年底,教育部规定,凡自费留学生需经过统一考试,经教育部核准合格后,才能出国留学。同年10月,教育部组织了考选委员会,12月举行了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的共751人,结果录取327人,于次年陆续前往国外留学。

国民党政府还于1944年宣布,所有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一律由中央办理,取消各省派遣留学生的权力。同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将派44名学生赴美留学,教育部以这44人成绩太差为由,不与派遣。于是,各省官费派遣留学生逐渐减少而至废止。各省考生必须在全国统一的留学考试中,参加激烈的竞争,这对来自边远省份的考生十分不利。

上述南京政府的留学政策,有些实行了,有些并未实行,尤其是抗战后期“宏伟”的留学计划,大半流产。其主要原因是“计划”脱离实际,政府战时财政紧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派人出国。

三 留学国别及其概况

(一) 国统区派出的留学生

根据国民政府档案,抗战期间,从1937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566人,这当中,1937年度含有抗战爆发前夕的部分人员,真正抗战期间的不足1500人。其中美国最多,为1073人;英国次之,为310人;再次为德、法、印等国;其余几国则不足

10 人, 少的仅 1 人。详见下表^①。

1937—1945 年留学生留学国别表

| 学年度别 | 共计 | 美国 | 英国 | 德国 | 法国 | 比利时 | 意大利 | 日本 | 奥地利 | 加拿大 | 菲律宾 | 安南 | 印度 |
|------|------|------|-----|----|----|-----|-----|----|-----|-----|-----|----|----|
| 1937 | 365 | 201 | 37 | 52 | 14 | 4 | 1 | 49 | 2 | 3 | 2 | 0 | 0 |
| 1938 | 93 | 15 | 40 | 22 | 8 | 2 | 0 | 0 | 0 | 4 | 1 | 1 | 0 |
| 1939 | 65 | 39 | 26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1940 | 86 | 85 | 0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1941 | 57 | 54 | 3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1942 | 228 | 170 | 46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2 |
| 1943 | 359 | 358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1944 | 305 | 149 | 156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1945 | 8 | 2 | 1 | 0 | 0 | 0 | 0 | 0 | 5 | 0 | 0 | 0 | 0 |
| 累计 | 1566 | 1073 | 310 | 75 | 22 | 6 | 1 | 49 | 7 | 7 | 3 | 1 | 12 |

抗战期间, 除新出国留学者外, 尚有滞留国外的部分留学生。据 1938 年 5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 在国外的公、自费留学生尚有 2500 人, 他们主要是欧美留学生, 以美国分布最多。留美生 1937 年为 1733 人, 1939 年 5 月统计, 为 1163 人, 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战时派遣留美生情况大体如下:

庚款生: 清华大学利用历年节余的庚款基金, 资助部分学生留美。如 1944 年经考试录取 32 人, 次年放洋, 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杨振宁便在其中。

奖学金生: 1944 年秋, 应美、英两国政府之邀, 教育部选派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前往两国深造。是年 12 月在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兰州、建阳七地举行考试, 录取留美研究生 61 名,

^① 此表据国民政府档案(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 教育(一),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892—893 页)改制。其中 1937 年度的数字多为战前所派, 如日本的 49 人显系抗战之前, 因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再未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其中工科 41 名、农科 20 名。另有留英研究生 65 名、实习生 69 名。1945 年陆续出国。

军事留学生: 1943 年 6 月下旬, 军委会派海军军官 50 名赴美国学习, 由翟瑞乐中校协助训练。另据《中央日报》1943 年 3 月 12 日报道, 一批中国空军留美学生学成毕业, 在美西部空军基地举行毕业典礼。由居里博士宣读罗斯福总统的致词中说: “诸君乃在美国受训之最近一批中国飞行员, 诸君已维持第一批受训人员所建立之崇高水准, 吾人对于诸君之成就亦极感荣耀。”由此可知空军留美生不只一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鼓励知识青年应征入伍, 规定优秀者可赴美深造。据 1944 年 9 月 22 日《中央日报》载: “已有若干人考入留美空军或陆军, 双流县从军学生刘源, 已被选派研习炮科, 在赴美途中。”

政府部门选派生: 1943 年教育部选派 75 名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副教授以上研究人员, 10 名中央研究院理工农医研究人员, 10 名教育行政人员赴英美考察研究, 期限 1 年到 1 年半。1943 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各派 1 名教授赴美讲学, 教育部选派蔡翹、金岳霖、张其昀、刘乃诚、肖作梁、费孝通前往。次年又选派杨振声、汪敬熙、萨本栋、陈序经、陈容光、容启东等教授赴美讲学。1945 年又有梅贻宝、严济慈、郑作新、袁敦礼、林同济等人出国。1945 年 4 月交通部派出 110 人赴美实习铁道业务。他们俱为我国具有资历之高级技术人员, 包括曾任铁路局局长, 现任总工程师及副总工程师人员, 平均年龄 35 岁以上。

自费生: 上述 1943 年 12 月教育部举行首届自费生考试, 录取 327 人, 全部赴美学习。

抗战爆发后, 留英教育趋于停顿。30 年代中期是中国人留学

英国的鼎盛时期,1934—1936年达500人。^①而1937—1942年教育部签发留学证书不过152人。^②1933—1946年中英庚款董事会举行了9次考试,共选拔庚款留学生193人^③,其中抗战期间庚款生有52人。1937年第七届考试,录取24名,因欧战爆发,无法赴英,改送加拿大。隔了几年又举行了一次,仍称第七届考试,计录取24人。1944—1945年第八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录取28人。1942年后,同盟国之间为加强文化联系,有互换教授和留学生之举,1942年英国文化董事会设置10名中国留学生奖学金名额。教育部于9月25日26日在重庆、昆明、桂林、汉中四地进行考试,录取沈元等8人。同年,英国工业协会亦资助31名中国工科学生赴英国工厂实习。前述1944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工业协会等机构再次赠送65名留英研究生名额和69名实习生名额^④,经考试选拔,1945年放洋。

抗日战争是留德教育由胜而衰的契机。1936年中国留德人数已达500人,1937年增至700人,其中公费占20%。抗战爆发后,不少留德学生辍学归国,而赴德者寥寥无几。德国发动二战后,赴德留学完全终止,当时滞留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约200余人^⑤,这批学生绝大多数学理工科,文科只31人。欧战爆发后,有的转徙到北欧一带谋生,也有的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多数进入德国工厂做工维持生活。德国战时工厂缺人,一些留学生在里面担任工程师。“因为战

① 《留学制度之商榷》,《教育杂志》第25卷10期,1935年10月。

② 《中华年鉴》(1948年), (下), 中华年鉴社1948年编印, 第1747页。

③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580—1581页。

④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889—890页。

⑤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1)—393。转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时生活的痛苦,与在德常受外来的刺激,大部分留学生均真正埋头苦干。多数同学能在德工作者,皆受人相当敬重”。^①

(二) 伪政权下的奴化留日教育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派遣留日学生,但中国人留日的历史并未终结,因为各伪政权积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沿海地区的青年学子自备资金赴日求学者也大有人在,因此,在国统区停派留日生之后,沦陷区的留日活动仍庚续未绝。

在各汉奸政权中,伪满留学教育自然起着示范和主体作用,不仅实行最早,而且规章制度完备。^②依据1936年确立的学席定额,每年派往日本国内的留学生222名,在日的伪满留学生数1938年为1519人^③,1939年1204人^④,1940年为900人^⑤,1943年1004人^⑥,其他几年未见确切数字,估计整个抗战期间至少有2千多人。

相对于伪满高度集中的留学教育体制而言,关内伪政权的留学教育呈现出放任和散漫的格局:没有划一的留学规章,没有统筹的留学计划,各个地方的伪政权可自行派遣。

华中方面,南京“维新政府”1939年9月选派37名学生赴日,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教育部及广东、湖北、江西、上海、汉口、厦门等伪省市教育厅、局均先后派遣了留学生,据抗战结束时的不完全统计,华中伪政权共有留日官费生40名,其中广东省

① 《1946年留德返国学生登记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自《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85页。

② 详见拙文:《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抗战中的中日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

④ 武强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二),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56页。

⑤ 武强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二),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330页。

⑥ 武强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二),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02页。

12名,湖北省10名,江西省1名,上海市1名,汉口市4名,厦门市5名,海南岛3名,伪教育部4名。^①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实际人数。

华北方面,据“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档案记载,1938—1943年,华北各省市,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平、天津、青岛等伪政权,总共派遣留日学生943人,其中官费411人,自费532人^②,不过这个数字也存有遗漏。

抗战期间各伪政权总共派遣了多少留日生,未有确切统计。有人“粗略估计,公、自费生合计在8000人左右”^③,这不包括台湾。在日本投降时,留日台湾籍学生尚有近5000人,抗战期间,台湾留日学生的总数估计也有此数的2倍,即万人左右,这样整个中国抗战期间的留日学生要在1.8万人左右。这个数字为国统区派遣留学生的十多倍。

由于日伪对留学教育比较重视,战时留日学生的学业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前。伪政权规定留日学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并通过考试选拔。赴日生多数能入日本大学和专科以上学校学习。据不完全统计,战时留日学生80%以上在日本专科以上学校就读,这个比例高于战前。事变前,留日学生参差不齐,事变后由于伪政权加强统制,留学生自身也比较专心向学,不问外事,故成绩反较战前为佳。

(三) 中共派出的特殊留苏生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曾作了一个决定,寻找和收容革命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把他们分批送到苏联去接受教育,为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5,案卷15363。

②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2021,案卷号505。

③ 王奇生:《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1936年,共产国际同意将距莫斯科50公里的莫尼诺疗养院改为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儿童院。当时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委派师哲去负责那里的工作。于是1937年前后,一批特殊的中国留学生来到苏联,他们是中共派出的一批高级干部子女。如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刘少奇之子刘允斌,朱德之女朱敏,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等等。

抗战爆发后,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从欧洲辗转到达莫尼诺;有的孩子是从延安保育小学出发借道新疆进入苏联来到莫尼诺的;黄平之子黄健,刘鼎之子刘莫阳等出生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也陆续从儿童院转到莫尼诺集中。后来经新疆赴苏联的通路被盛世才阻断,由国内送往苏联的孩子大大减少。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大批西班牙等国共产党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子女也来到莫尼诺儿童院。后来40多个中国孩子全部迁到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他们中最小的3岁,最大的16岁。被分到不同的班级,与其他国家的儿童混编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孩子们年龄大的参加预备役,接受正规军事训练。朱德之女朱敏被德军抓进集中营。黄健1941年去伊万诺沃体育学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坚持完成了学业,50年代回国后,培养出郑凤荣、倪志钦等跳高运动员。1942年5月,毛岸英被送往苏雅士官学校学习,8个月后进入列宁行政学院,毕业后去苏联总参谋部学习。后来就学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还曾在苏军中担任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这些孩子在苏联进入各类学校学习。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成绩都不错。刘鼎之子刘莫阳树立起了探索宇宙奥秘的志向,1982年在病床上坚持完成了积累多年的著作——《我的假说》,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异议。朱敏1946年从德国回到莫斯科,开始了迟到的学习生涯,她以顽强的毅力很快学

习完中学的课程,1953年毕业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回国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俄语教师。

抗战时期,中共除遣送部分孩子去苏外,还派出了某些高级干部,到莫斯科一边休养一边学习,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杨至成、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谭家述等,便是其中的一批,于1938年赴苏。杨至成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委总供给部长,因自身患多种疾病被派去苏休养、学习。他们到莫斯科后被安排住在郊区一个叫空措沃的地方,这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党校,是一群别墅式建筑。1939年又搬到一个叫库契诺的庄园式建筑里。住在空措沃和库契诺的20多个中国人,除了几个小孩之外,正式参加学习的有十几个同志,他们打乱地方和部队的界限,共编成一个党支部,书记由陕北来的马明方担任,上面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领导。学习共分两个班进行,一个政治班,一个军事班。地方工作的同志大部分参加政治班学习;部队上来的同志基本都参加军事班学习。教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派的。以苏联卓越的党务活动家和军队的缔造者伏龙芝名字命名的这个高等军事学院,是苏联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最高学府,他们在这里特地为中国同志开设了一个特别班。有关组织和领导对他们的学习抓得很紧,要求也很严,基本上是按正规军事学院的架势来安排每日的作息制度:早晨出操跑步,上午上课,下午讨论、复习或操练,晚上集体读报;过一段时间要搞个测验或考试,平时外出要请假,只有星期天才可放假休息。杨至成因曾参加过苏联军校的学习,对这种学习生活并不陌生,只是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开始一下子很难适应。但他强迫自己一步一步地照上面的要求去做,绝不“偷工减料”。他在军事班学习的内容有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有进攻战、防御战作战指挥的原则与艺术;有诸兵种、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有战争的后方勤务学等等,光笔记本就记了几十本。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不到3个月,战火烧到莫斯科外,在库契诺学习的中国同志,只好结束学习。

四 海外留学生活

(一) 艰难的困境

战时留学生生活异常艰苦,随着战争的进展,一部分留学生家庭沦陷于战区,经济来源中断;即使家庭未陷于战区的学生,也因战争冲击和国民政府统制战时外汇,经济远不如战前充裕。

欧战开始后,英法两国或国土沦丧,或炮火连天,许多高等学府或陷或毁,或停或迁。其本国学生大都奔赴前线,中国留学生则被迫四处流浪。此时还在留学德国的200余学生,有的转徙到北欧一带谋生,也有的历尽艰辛回到祖国,但多数则进入德国工厂做工维持生活,还有少数学生被法西斯抓进集中营,惨遭迫害。留学生们的艰难处境曾得到社会的捐助,如德国实业家伍尔福氏将10万马克资助我国工程人员来德实习。其中先将1.5万马克交远东协会办理救济留德中国学生,后又把余下的8.5万交由中国驻德大使馆全权支配,作为留德青年研究及生活之用。中国驻德大使馆为慎重起见,特组织“伍尔福奖学金委员会”,决定支配原则及核计补助金办法。^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的国际汇兑渠道受阻,留美学生的经济来源完全中断,几有流落海外之虞。据1942年初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报告称,留美中国学生尚有987人。^②为了维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0页。

② 《新华日报》1942年5月14日。

持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国驻美大使馆与美国政府洽商,美国政府同意延长中国学生的居留时间,并取消移民律中不准留学生做有酬工作的禁令。此后数百名中国学生分别被美国一些国防工业、政府机关聘任,参加美国的战时工作。^①美国国务院从总统紧急用款项下拨出80万美元,以每人每月75美元资助成绩优秀而生活困难的中国学生。国民党政府也拨出30万美元,在美国组织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以奖励留美学生的战时学术研究,并对经济困难的留美学生予以适当救济。该委员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兼任主席,聘请赵元任、侯德榜等一批专家学者为委员。^②

日本国内原来物价低廉,在国内沦陷区读书一年的费用,可够开支在日本两三年所需的费用。^③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国内实行全面的战时体制,除频繁地征兵外,对粮食和日用品实行严密的配给制,致使留日学生的生活十分窘迫。进入1945年后,情况更为恶化。是年3月中旬,日本当局宣布为适应“大东亚决战”,自4月1日起,全国各学校停课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学生多数束装归国,到日本投降时,留日中国学生只剩下四五百人。^④此外,留日学生还要经常受到日本军警和浪人的压迫和虐待。有人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留日学生受敌人严厉的监视和限制,虽谨言慎行有时亦不免发生意外祸灾,真是人人自危!环境恶

① 《新华日报》1942年6月17日。

② 《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日。

③ 《姚颂恩自传》,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案卷号15355。

④ 王奇生:《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劣,无以复加,精神上所受种种刺激,实为毕生难忘。”^①

(二) 抗日宣传及活动

抗战时期,中国留学生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他们不能亲自在国内战场杀敌,也想为抗击日寇尽上点力量,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便成为不少人的一项重要活动。曾任山东大学校长、山东政协副主席的吴富恒教授,1940年赴美留学,他同哈佛大学学生会主席周一良一道,发起过一次中国思想演讲会,请瑞恰慈讲《孟子》,赵元任讲“中国学”等,目的是用宣传中国文化来宣传抗日。他回忆说:“我们有时还到波士顿的教堂讲演,讲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引起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②他们还组织时局讨论会,探讨抗战的有关问题。

后来的中国女外交家龚普生,1941年9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留美期间,在美上层人士和青年中做了大量工作。在取得学位后,具备了经常被各种团体邀请演讲的可能,她经常进行各种演说,借以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罪行。经常拎着一只衣箱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有时一天要去三四个地方讲演或座谈。她到过美国东、西、中、南的各个著名大学,足迹踏遍半数以上的州。就在这时,认识了美国一些知名人士,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向他们交谈了中国的抗日问题,他们成了龚的朋友。^③

解放前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留英学子李泰华先生也回忆说:“伦敦附近乡镇的民众团体大都同情中国,纷纷要求当时的‘中

① 《朱丽春自传》,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案卷号15355。

② 吴富恒:《学好本领 为祖国服务》,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4页。

③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3页。

英协会’派人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或俱乐部,给他们讲述中国的抗战形势及其前途,该会都是让我去出席。我为此几乎有一年时间未到学校听课,未按时呈交博士论文。迟至 1939 年秋始取得博士学位后,才回到抗战陪都重庆任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①

电影明星王莹,留美期间,1942 年曾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发表了洋溢着战斗豪情的精彩演说。她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讴歌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痛斥了日本法西斯野蛮罪行,呼吁东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会后,作为代表团成员,又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大学发表演说。美国多种报刊纷纷介绍王莹事迹和演说,有的称其是“从她的战斗经历的土壤中开放出来的勇敢、乐观和国际友谊之花”。1943 年春,王莹到白宫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抗战歌曲,受到美国总统和夫人的赞扬。^②

抗战时期,留日学生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不甘于亡国奴的地位,少数爱国青年也暗中进行爱国活动。当年为摆脱供职伪事的纠缠而留学日本的叶瑛桐说:在柔道场上,“认识了东北同学王德成”,两人“一见倾心”,以后经常互访谈天。他谈到东北人民受日本人的压迫欺凌时,“常常落泪”。以后四个人秘密组织了“东亚青年抗日联盟”,散发抗日传单等。^③还有部分东北留学生在中共和进步人士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如 1944 年,被选送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伪陆军军官学校“优秀生”吴宗若、张文善、王成善等,毕业返回东北时,中途潜回关内,参加了革命。^④

① 李泰华:《留学经过概略》,《留学生活》,第 296 页。

②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32—1033 页。

③ 叶瑛桐:《留日生活琐记》,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留学生活》,第 245 页。

④ 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9—321 页。

(三) 刻苦攻读与拼搏

抗战时期,许多中国海外学生,忍受了空前的饥饿和战乱的环境,在艰难困苦中,攻读不辍,顽强拼搏。

世界著名的东方学家,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羨林教授,1935年凭借在清华四年全优的成绩考取德国留学。初到哥廷根大学,他选课以希腊文为主,但不久就转攻梵文。这是一种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季起初也觉得困难,但鼓足勇气要征服它。根据德国规定,考博士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选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印度学,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这是他在为自己增加压力,本可选汉学作副系,但他早在国内就已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当时有些留学生在外国,用老子和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季鄙薄这种人,决不步他们的后尘。学习一种新语言是很艰苦的,同时还得作博士论文和课程考试的准备,时间之紧,任务之艰可想而知。他把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在家吃早点,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中午在外面吃饭,饭后仍回研究所,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六点多才回家。后来他又学习了吐火罗文,成为我国现代屈指可数的梵文专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①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35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1936年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他在学业上也是十分勤奋的。据该院档案记载,他曾在人类学系、殖民地问题系选课,考试成绩都很好。对于英语,他是花了很大功夫的。开始在参加学术讨论会时,连听懂语言都很困难,于是他坚持每天上午阅读半小时的《泰晤士

①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2页。

报》，或收听电台广播，到后来开始博士论文写作时，英文的表达能力就已很不错了。费的性格是开朗的，但不喜应酬。据说，他每晚沿着泰晤士河散步，就是为躲避都市的喧嚣，认真地思考问题。1939年间，他将从国内带来的开弦村的调查材料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分析，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和研究，创作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提供给专门的考试委员会。论文并迅速出版，引起国际人类学界的重视。因为它没有局限于对异民族、原始部落的描述，而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本地社区和文明社会，带有一定的社会学研究的意味，从而把人类学研究推进了一步。两年的留学生活，为他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山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七届人大代表曾呈奎院士，1940—1946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他回忆说：“当时国内正在抗战，前方将士为国拼死御侮，全国人民亦陷在战乱和困苦之中。我只想到美国学到有用的知识，回来发展我们的海洋科学事业，造福人民。我觉得倘贪图美国之舒适环境，不抓紧时间学成归国，就对不起国人。有此决心，所以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争分夺秒，不曾稍歇。我读博士学位时，开始也像他人一样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后来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晚上再到实验室。开始时工作到夜里12点，后来逐渐延长至凌晨一二点，再后来就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别人来上班，我就回去睡觉。睡到中午12点，吃过午饭后，再到实验室工作。这样我一般每天睡四五个小时。这种工作方式持续了一年多。”^② 1942年5月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分几个部分发表在美国的有关学术刊物上。

①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6页。

② 曾呈奎：《海外留学 造福人民》，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留学生活》，第7页。

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史学家冯家一, 1937年留美,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边工作, 一边读书。先是读东方学的课程, 如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突厥文、回鹘文等课程, 后来又进入人类学系, 专门研究人类学和考古学。他的研究兴趣虽仍是中国边疆史, 但重心已从东北史转到西北史, 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史。突厥文、回鹘文研究的学者, 在世界上是不多的。冯开创了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冯家一是一位勤奋过人的学者, 在美期间, 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德文、法文、俄文, 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的条件, 摘录过大量的有关火药、丝织等史料, 探讨过科技史的问题, 为日后继续研究作好了准备。^①

(四) 卓越成就和贡献

抗战期间, 中国留学教育, 尤其是留学欧美, 规模缩小, 人数减少, 然而经过学子们的艰苦拼搏, 取得了不少突出的成绩, 作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 造就出一批出类拔萃的科技精英和各类人才。这里仅略举几例。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钱学森整个抗战期间及其前后共10多年, 都是在美国度过的。1935年他留学于麻省理工学院, 一年后在该校航空系获硕士学位。后慕名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 那里有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钱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 留校任教。从卡门的得意门生进而成为亲密同事, 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 许多文章都是他俩共同合作的, 著名的“卡门——钱公式”, 又称“卡门——钱学森法”, 就是由卡门提出命题, 由钱作答的。这个公式第一次发现了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和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1943年美国军方委托钱进行重大军事研究, 钱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向卡门建议, 在美国设立

^①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 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第1100页。

一个“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集中研制导弹,他还建议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技术。在二战中,钱的研究成果为美军的胜利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曾受到美国空军部的高度赞扬,被人认为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终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钱学森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进展,此时已成为在火箭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于1955年回国。之后的几十个春秋,为中国的国防尖端科学,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导弹之父”。

“阻遏德国飞弹”的钱伟长。钱伟长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但因英德宣战,改赴加拿大。1940年夏,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师生二人共同攻克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半年之后,终于登上了弹性力学理论这座高峰。在艰苦的思索和浩繁的计算中,他运用张量分析原理,找到了那个统一的方程式,被公认为“钱伟长方程”,誉之“划时代的工作”。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又到美国,在冯·卡门的门下,主要课题是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不久,就接连发表好几篇论文,并在研究、设计、制造等环节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时值二战,伦敦正遭德国火箭威胁,英国首相向美国求援。钱伟长等提出了运行火箭受到干扰,必缩短射程的对策,有效地阻遏了德国的飞弹。邱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激,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岂不知使他免遭厄运的是中国青年。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钱伟长1946年回国,后又首次

①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8页。

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此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捷的解法,1955年获国家科学奖。迄今国际上仍用此法处理这类问题。他提出的广义变分原理和环壳分析解等成果,被誉为“具有我国独特方法的重要贡献”。^①

居里实验室“最优秀的”科学家钱三强。钱三强1937年8月在严济慈教授的引荐下,到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研究室学习。身居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他却终日循环于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三点一线”之间。午间经常在工作台旁简单地吃几片夹心面包,喝杯红茶,稍稍休息,就投入工作。晚上又经常伏案钻研至深夜。他不仅学懂理论,而且进行实际操作。艰苦的磨炼,虚心的求教,终于使他在原子核科学这个新天地里,获得了更多的科学自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1940年完成博士论文,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又在实验室工作,直到1948年回国。居里夫妇在其留学回国时所写的书面评价是“钱先生表现出科学人员所应有的特殊素质……他心智敏慧,对科学既有满腔热忱,又有首创精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10年来,在我们实验室实习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②钱三强1948年回国后,曾任新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制,为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发展,特别是建立和健全学术领导,培养科技人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和协调重大科研项目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获得英国专利的王大珩。王大珩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化学。在英学习工作的10年中,做出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科技成果。到英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关

①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157页。

②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6页。

于光学设计的处女作,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差对最佳焦点位置的影响,首次提出了用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理论。至今,该文中所论述的一些观点仍是某些光学系统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理论根据,被国际同行多次引用。1941年王大珩转到雪菲尔大学,师从于国际著名玻璃专家特纳教授,专攻光学玻璃。作为国防工业重要领域的光学研究是不可能让外国人参与的工作,但为了战争的胜利,1942年英国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不得不聘请才华出众的王大珩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许多成果因保密而未公开面世。他先后利用光谱方法不同退火条件对折射率、内应力、光学均匀性的影响,发展了V棱镜精密折射率的测定技术。作为英国最早从事稀土光学玻璃研究的王大珩,其研究成果获得英国专利。至今他的研究成果还是众多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工具。^①回国后王大珩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作出了卓越的成就,198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是首席获奖者。他还是后来被称之为“863计划”的起草者。“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带动和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外,还有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闻名世界的数学大师陈省身等等。他们都不仅对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孔繁岭,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6页。